

春华秋实

深圳文艺发展理论与思考

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编

——海天出版社——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序言)	张俊彪 1 页
文化视角中的深圳文学	杨宏海 3 页
特区文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吴俊忠 17 页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 ——谈现代都市文化与深圳都市文学	李 华 21 页
照彻千山月更明 ——对于影响深圳文学发展的主要 障碍所作的初步批评和清理	斯英琦 29 页
论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漂移的踪迹 ——当下批评方式的若干断想	杨益群 41 页 胡 滨 46 页
文化旅游舞蹈的特性和类型 ——兼评深圳“世界之窗”旅游舞蹈	于海燕 54 页
试论深圳现代舞异质同构发展趋势	李建平 60 页
关于深圳特区群众舞蹈工作的思考	廖志迈 68 页
特区舞蹈文化探源	石 钢 75 页
深圳戏剧文化建设之我见	刘胜佳 83 页
“红船”的旅程	窦英杰 90 页
从深港戏剧演变看华语戏剧文化	熊源伟 96 页
戏剧,需要拥有环境	吴建伟 101 页
深圳的戏剧现状及未来	黄祖述 106 页
我国先锋派戏剧的由来与思考	从 容 109 页
中西戏剧:从殊异到交融	倪鹤琴 114 页
写意性——戏曲之魂	王公序 119 页

细节妙用	应 棋	 122 页
大都市与国际艺术博览会 在市场经济中拼搏	谷福成	 125 页
——谈深圳美术	韩金宝	 128 页
走出困境		
——深圳美术评论工作的现状与未来	陈 君	 131 页
深圳城雕与国际都市的风范	孙振华	 133 页
艺术市场的文化准备	鲍传江	 140 页
亦喜亦忧的深圳书法	方 斌	 143 页
当代书法文化中的深圳现象		
——论大都市书法走向	吴 为 包 新	 147 页
浅议深圳书法的现状与未来	邹炯文	 158 页
论书法艺术美与人的素养情趣之关系	李高扬	 163 页
深圳特区的摄影艺术形态	陈予之	 168 页
自我·传统·外来文化		
——我的摄影观	赵连勤	 176 页
略论摄影创作的自我表现	薛国良	 178 页
关于新时期的深圳摄影创作导向	小 文	 183 页
深圳国际大都市文化发展路向思索	顾旭光	 189 页
从深圳文化现状谈增创文化优势		
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		 196 页
关于“文化观念变化”引起的思考	朱黔宁	 203 页
发掘民俗文化资源的成功尝试		
——深圳华侨城旅游文化调查报告	杨宏海 王地久	 209 页

写在前面的话

张俊彪

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已经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了，曾经产生过影响过人类整整数千年还将继续发生影响作用直至非常久远的年代的伟大文化名人和不朽文化经典，但活着的人们仍然为文明与文化的存在与价值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阐释着。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

社会发展的历史一再向世人证明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明层面与文化水准在国家形态和民族意识中所处的地位，不仅体现出这个国家的国民整体素质和国力财力军力的综合状况，而且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或民族在国际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只有孕育了真正丰富知识生活文明的民族，才或多或少对人类有所贡献；只有那些为了“转量为质”，将前途放在永恒生命的启示，而不放在行使物质力和武器的无谓努力中的民族，才对人类有贡献。永恒的生命在有限的暂时性存在中经常会继续成长。同样，衡量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是否成为国际文化名城或国际文化中心的唯一标准，不是经济状况和建筑状况，而是它涌现出了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具有国家水准与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艺术代表性的成果和代表性的人物。任何一个国度或民族，为了实践这一人类永恒的追求目标，都在不惜代价地为着孕育和催发文化艺术神品和文化文明圣贤而精心竭力地营造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氛围。文艺思潮，文艺理论，对于文化艺术的提升与导向，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历来就像一只鸟儿的两张翅膀，缺一不可。理论应该而且必须超前，没有理由滞后。如果它滞后了，那么创建一种崭新的文化文明的辉煌殿堂将成为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梦幻。

由于我们懂得了这些,我们才举行了深圳市文艺发展理论研讨会,并将产生的论文筛选编集成这本书。

这是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辑出版的第一本文艺理论专集。

1995年10月29日于深圳

(作者系深圳市文联主席)

文化视角中的深圳文学

杨宏海

八十年代初,当南中国海岸的一个边陲小镇被历史赋予“经济特区”的角色,作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便被抛到中国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之中,多少人用惊疑参半的眼神注视着她的成长。十四年过去了,深圳已实实在在地变成一座现代化新城,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连当年将深圳视为“文化沙漠”的文化人,也开始“刮目相看”这片神奇的土地。作家梁晓声先生说:“令我惊讶的是……深圳的文化和深圳的经济,几乎是以同一种速度同步发展的。如果说它十几年前是一个海边小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所谓文化环境可言,那么伴随它的经济发展,它的文化骨骼也已经开始形成……这带有某种奇迹性。”(梁晓声《有文化的深圳人》,载《深圳青年》1994年11期)是的,深圳本身就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奇迹。作为深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创作,也经过了超乎寻常的发展历程,逐步成为国内文坛关注的一个热点,亦引起来自各方迥然不同的议论。如何评估深圳十四年来的文学创作并预测其发展走向,是深圳文艺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作大略的探讨。

一、文化转型:深圳文学的人文背景

作为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深圳,实质上就是最早进行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地方。对深圳所处的人文背景和“文化转型”的基本因素,我在1989年5月石岩湖“特区文学座谈会”上,作了这样的表述:“一、窗口式的地理环境。邻近港澳,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列;二、移民式的人口结构。在特区百分之九十二的人是移民,特区作家也大都是移民;三、

· 混合型的经济结构。外资等三资企业已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以市场经济为主;四、过渡期的社会结构。借鉴香港有关法规,按国际惯例办事。”(见《深圳特区报》1989年6月11日《特区文学创作座谈会纪要》,黎明记录整理)若从更宏观的视角,我们可以对深圳的人背景作这样的描述:一、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二、一国两制的临界线;三、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四、商品经济的大市场;五、移民汇集的新都市。这种人文背景,势必对深圳文学创作发生重大影响。

由于上述因素,深圳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最活跃的一个地带,具有地缘和人缘两方面的优势。先从地缘优势来看,评论家余秋雨把深圳放在当代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来考察,认为“当代世界为儒家文化、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三大文化板块相互冲撞所困扰,而深圳却是一个难得的文化缓冲、文化和解之地,是一块三大文化板块都为之留出了一定空间的‘三角地’,其文化环境疏松、可塑性很强。这种时空背景适合于以开放、探索、创新为特征的青春型文化生长。”(曾文经《建设一个“文化集散地”——余秋雨纵论深圳文化发展战略》载《深圳特区报》1994年11月25日)此说颇有见地。深圳作为连结内陆与香港的边缘地带,由于远离中原,既没有象内陆地区那样有博大、深厚的儒家文化的积淀,亦没有象香港那样长期承受西方文化的渗透,这种既不同于内陆又区别于香港的“松软地带”,便为新质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从全国文化格局来看,九十年代中国大体形成“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两种文化形态。如果说“北方文化”代表一种传统的文化,那“南方文化”则代表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型文化。将北方的《废都》、《白鹿原》、《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与南方的《商界》、《外来妹》、《公关小姐》、《情满珠江》等作品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南、北文化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毫无疑问,深圳应成为“粤军”——南方文化的“排头兵”。“春江水暖鸭先知”,由于深圳最早踏入工业文明的门槛,最先进入文化转型的实践(试

验),使特区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意义不在于它的地域性,也不仅仅是一种题材优势,重要的是它的现代性。“深圳的今天,是内地的明天”,深圳的文化转型是随着社会转型而进行的,也就是从传统型文化向现代型化的跨越。这种“现代型文化”包括它所反映出来的新的文学观念、新的审美方式,也包括它所表现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新型人格等。这些富有时代色彩的东西是植根于深圳这一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中的。在这独特的人文背景中,将会创造出一套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特区文学的价值所在。

再从人缘优势来看,深圳是个各地移民共处、多种语言混杂、新风旧俗渗透交叉的城市,当代改革飓风刮来的知识分子和民工南下潮,使深圳成为“藏龙卧虎之地”,一批崭新的、朝气蓬勃的作家正随着特区的繁荣而渐渐崛起,有自己独特的构成特色。这里有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如林雨纯、刘学强、黎珍宇、张黎明、廖虹雷、蓝运彰等,他们凭借对故土的挚爱和对文学追求的执着,勤奋耕耘,各有成就,当之无愧地跻身深圳文坛,引起了文学界的注目。

诚如深圳的人口结构是以移民为主那样,深圳移民作家也是这里文学队伍的主体。在特区文学发展史上,人们不会忘记早期前来深圳文坛开拓(有些是到此挂职、生活)的作家,如韦丘、陈国凯、朱崇山、谭日超、陈荣光、郁茇、钟永华、戴木胜等,他们对深圳文学事业的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大批外来作家带着中原塞外、西北江南的各种文化,投入深圳特区文化的熔炉当中,萌生着具有开放、探索、创新的文化品格,表现出深圳文学海纳百川的潇洒情怀。他们中从事小说创作的有:乔雪竹、刘西鸿、彭名燕、张俊彪、星城、吴启泰、梁大平、谭甫成、张翅、张伟明、林坚、刘树德、无君、王勇刚、王小妮等;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有陈秉安、梁兆松、胡戈、王向同、陈锡添、王雪松、王海鸿、刘志文、黄日旭、夏萍、安子、燕子、黄毛、林晓东、蒙敬杭等;散文创作有李兰妮、袁炳、郭洪义、陈浩、黄萍、崔玲、

彭颂声、卢绍武、王笑园、曾培新等；诗歌创作有赵婧、客人、费岚岚、冯永杰、关飞、夏炎炎、刘更申等；文学评论有胡经之、钱超英、斯英琦、李小甘、曾文经、胡滨、杨作魁、杨益群、吴俊忠、宫瑞华、倪鹤琴、李华、钟海帆等。

文化转型给深圳作家们展现了一个社会变革异彩纷呈的崭新世界，呼唤深圳作家在这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深圳特区，也向它的文学提出了一个历史的使命——为推动全国的文化转型作出自己的努力，这就是深圳文学所处的人文背景。

二、新的人文精神：深圳文学体现的文化观念

1992年10月在肇庆蓝带山庄召开的“京穗部分评论家信息交流会”，是一次对南方文学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南北文学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展开南、北文化观念的一次正面碰撞。争论的焦点是进入市场经济后，文学的审美取向和批评标准是否应该有所改变，是否要面对新的生活新的制度产生新的审美取向？会议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颇具学术争鸣气氛。针对北方学者明显的“乡村美、都市恶”的审美趋向，我从广东及深圳创作的实践，提出了不同看法参与讨论。我认为，探讨文学发展应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观照。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下一代就将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谁也不会抱怨的。”（《生活与美学》）所以，从深圳的创作实践来看，建立一种与新文明相适应的人文精神是需要的（《纵论南北文学创作，呼唤新的人文精神》，见1992年11月8日《深圳作家》）。

在深圳这块改革开放超前试验区里，诗人们往往最及时地传递和反馈出社会变革的最新信息。早在1979年春，诗人谭日超站在时代的高处，面对一河之隔的香港，立足自己正向四化起飞的祖国，将我们的发展速度等与香港进行形象对比，深刻揭示

了它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一面,大胆抒发自己的见解:“香港呵,好拥挤的一隅人间竞技场! /公正地说,你的名字,未泯当日的清香, /我知道,金元口袋处处装着血盆大口, /但我指出,浊浪里,你有另外一种光亮; /这种光亮,只要我们一旦发现它便是能源, /可以溶解傲慢无知,焚尽那夜郎思想。”(《望香港》)诗人韦丘在《边城赋》中,也以诗人的敏感,唱出了“时代卷起的暴风骤雨, /终于冲塌了心造的藩篱。 /科学和技术渡过了界河, /东方的文明由此向西。”昔日戒备森严的政治边防不见了,今天这里变成了对外开放的窗口,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窗口,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窗口!这些诗十几年后重新诵读,更加可体味其哲理的深邃与历史内涵的深厚,这都应归功于作者全新的文化观念。

社会、文化的转型,生产、生活的变化,势必要求建设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现代文化体系,其核心所在便是人的本位。亦即是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的文化。建立起具有独立个性的人文精神和文学品格,应该是生活在改革开放“试验场”的深圳作家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综观深圳文学十四年的创作实践,能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并引起“轰动效应”的,我认为大致有三次。而这三次“轰动效应”的冲击波,恰恰是来自深圳作家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张扬!

第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刘学强有关特区青年更新观念的纪实体散文,着力弘扬“敢为天下先”、“应做就去做”、“无功就是过”等新观念,显示出开放之初特区生机勃勃的时代风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读此类作品,宛如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是处在文化转型期的深圳作家心灵的呼唤,在内地引起不小的反响。《中国青年报》为此专门辟专栏,组织全国青年开展对“深圳新观念”的讨论。内地许多热血青年,就是读了刘学强这类“新观念”的文章(后结集为《红尘新潮》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毅然南下投奔深圳的。尽管评论界对《红尘新潮》没有给予关注,尽管作家本人也在尔后从事小说、影视等多种体裁创作并颇有收获,但我坚持认为,从文化视角看,或从深圳文学发展

史的角度看，刘学强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仍是他那本薄薄的《红尘新潮》。

第二次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正当内地“寻根小说”蔚为大观之际，刘西鸿的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以文化观念上的陌生感与超前性，引起了文坛的惊讶与亢奋。作家把希望的目光投注到经商品经济洗礼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身上。主人公在特区较为平等、自由选择的天地中，以“你不可改变我”的自信，去追求独立的个性意识。作品以新颖的叙述语言，“一种毫无牵挂的洒脱、一种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引起了关注，揭示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在崛起，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在整合、构筑。这种新的人文精神与新的人际关系，使人再不把自己当作仅是政治、历史、文化的动物，而同时也关注自己的实践利益，讲求礼俗、宽容，而不太关心形而上的精神痛苦与折磨”，“崇尚一种创造性的美，而不仅仅以自然为美”（钟晓毅）。如果说，“寻根文学”体现了丰厚的民族传统文化，表达了人的某种深层的寻根愿望和怀旧情绪，那么，《你不可改变我》则是在雕刻着未来的民族灵魂。作品发现并写出一种“及时发光”的价值观、以及“不可改变”的变化着的个性，预示着整个中国的文化变革正是孕育在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与骚动之中，体现了刘西鸿对特区生活敏锐的感知力。作品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并拍成电影《太阳雨》，在省内外掀起一股“刘西鸿”热。

第三次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北方兴起“新写实”、“新历史”小说，王朔的“新市井”文学亦风靡一时，而在百万打工者汇集的深圳，却出现了“打工文学”这一奇特的文学现象。以张伟明的小说《下一站》、《我是打工仔》和安子的长篇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为代表，前者写出打工一族“东家不打打西家，勇敢走向下一站”的“潇洒”，张扬一种开拓、冒险、自强不息的“打工精神”，后者则着力表现打工妹在充满机遇的深圳找到自我价值时的喜悦，呼唤“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两者都以主人翁亲身体验为背景，通过“文学”去展示“打

工”的社会实践,唤起人们对打工生活的关注与再认识,不仅道出打工者的心声,张扬一种人文精神,同时还成为一个信息的窗口辐射向内地,从而在读者中形成热点。正如1992年7月29日《文汇报》发表《“打工文学”异军突起》一文中指出:“它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

与此同时,一批热心的作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打工一族,或从打工文学中吸收素材进行创作。海天出版社不失时机地推出“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影视界则先后推出电影《特区打工妹》、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等,客观上亦为打工文学推波助澜。

深圳十四年来掀起的三次文学冲击波,都是由三十岁以下年纪的青年作家发起的,亦均是以新的人文精神作为内驱力,在读者中形成一股旋风。不能否认,这些作品水平参差,有的还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的不足。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作品以新的审美取向,将艺术触角直逼文化转型期的社会心态,不单引起文坛关注,同时也拥有广泛读者,它昭示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圳文学的文化走向,对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一次挑战。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是摆在许多作家和研究者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以新的人文精神震撼文坛的深圳文学,还有李兰妮的中篇小说《他们要干什么》,作品主人公在“呼唤强者”的同时,也在祈求社会营造“平等竞争”的机制;此外,彭名燕的长篇小说《世纪贵族》,主人公在参与激烈的商战中仍追求一种强烈的道德感:“不管什么社会,什么年代,情和义总是美德”;渴望在争权夺利的怪圈中“潇洒地超越自己”。这些作品以现代眼光热情颂扬市场经济及其社会、文化转型的进步意义,同时也以人性、人道主义的观点呼唤真情与道义,因而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三、文学景观:从“打工文学”到“新都市文学”及其他

去年我在撰文评介首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时,曾将获奖作家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专业作家,其二是“打工文

学”作者，其三是报刊编辑。“这些作家由于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审美情趣的差异，使其创作异采纷呈，给特区文坛带来不同的冲击波。”（《青春城市的文学景观》，载《深圳作家》1993年7月28日）时至今日，当我漫步在鹏城文学的艺术走廊，仍明显地感觉到，正是这三类型的作家，构成了深圳文学队伍的主体，他们辛勤的劳作，描绘了特区绚丽多姿的文学景观。

景观之一：“打工者”构筑“新都市”

深圳，是当今中国外来劳工聚集最多的一个地区，“打工”是当今深圳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在这座新兴的城市里，“哪一座建筑，哪一样产品/没有百万打工者的指纹/就是这百万打工者/为我们撑起了摩天大厦/就是这百万打工者/为我们搭起了祖国的南天门/就是这百万打工者哟/用民族不屈的脊梁/举起了改革开放的信心/就是这百万打工者/用发烫的情感/为我们谱写了新世纪的风韵/……”（吕书臣《致打工者》）生活是文学的土壤，仅以这首小诗，我们便不难理解深圳何以成为“打工文学”发源地的原因。

深圳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张伟明、林坚和安子。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和张伟明的《下一站》，两篇小说及其题目被广东评论家称之为“有形而上的文化寓言的意味”，在广大打工一族中引起强烈共鸣，迄今已成为深圳的“经典说法”。张伟明、林坚的小说着意刻划打工者趋向现代文明的艰难过程，敢于直面人生，表现出一种“沉重的潇洒”。而安子的作品则以“微笑看世界”的视角，试图给打工生活涂上一层理想色彩，因而满足了众多打工者“寻梦”的审美需求。侧重点各有不同，艺术风格也迥然有别，均先后获广东省作协第八、九届“新人新作奖”。此外，还有黄秀萍（《绿叶，在风中颤抖》）、冰野（《我想有个家》）、海珠（《703》）、黄毛（《今生有忌》）等。近期值得注意的有星月，他的长篇小说《天边那片云》被《深圳晚报》选载，在打工者中引起反响；还有一位女作者梦溯，在《特区文学》发表两部中篇《默默地拥着自己》、《敬你一杯苦酒》，写文化层次较高的“白领打工一

族”，文笔清新，人物鲜活，颇具艺术潜质。林坚写打工题材的长篇小说《有个地方在城外》已脱稿，近期提交广东文学节参选。

今年初，《特区文学》举起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帜，旨在以现代文化的角度，反映“新都市”及“新都市人”的心态、情感、生活方式及文化观念，揭示特区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塑造一批正在成长的“新都市人”的形象，从而促进中国“新质”文化的产生。可以说，在特区倡导“新都市文学”颇有意义，实则是社会、文化转型对深圳文学提出更新观念的要求。

广东作家张波在“新都市文学论坛”的开篇《都市人与都市文学》中指出：“近年，以深圳‘打工文学’的出现为代表的新都市文学已经崭露头角。”（《特区文学》94年2期）另一位作家何继青也在“论坛”中指出：“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的凝聚点，正吸引着城市以外广大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趋向文化认同……表现‘新都市文学’意义的作品在《特区文学》打出这面旗帜之前已经大量涌现，并且不乏优秀之作。”（《其实是一种文学精神》，载《特区文学》94年3期）这两位作家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引发我们对“打工文学”与“新都市文学”关系的思考。

我认为，进入市场经济的深圳特区，其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二，其一是“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原有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其二是大量吸引劳工，引来百万民工潮，参与都市商品经济建设。“打工文学”与“新都市文学”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都要展示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吸引，都要写出文化转型期的“都市人”（含“都市边缘人”）的生态与心态。可以说，是“打工者”在构筑“新都市”，亦是“新都市”在洗礼“打工者”。“打工文学”是“新都市文学”的初级阶段。大量的“打工文学”都写都市，但是否达到“新都市文学”的文化内涵，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具有“都市意识”，是否具有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新的人文精神。比如，林坚与张伟明两人都在写都市。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塑造了齐欢这个既能适应现代文明、发挥个人才智，又能取悦他人、保护自己的新人形象，表现出她与“都市”的亲

力,揭示了特区新城所具有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性,堪称具有“都市意识”的佳作。而张伟明的《我们INT》、《现在打盹》等作品,却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疏离与拒绝和对传统的田园风光及传统文化心理的眷恋。他的小说从审美角度看,起点颇高,但若以新的人文精神标准来衡量,他那“现代都市恶”的倾向即表明了一种文化观念上的滞后。近期对“新都市文学”进行创作尝试的有王小妮《热的时候》、张波《特区不浪漫》等,我们期待有更多能展现“新都市”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问世。

景观之二:从专业作家谈“阴盛阳衰”

专业作家是深圳文学的主干,在为数不多的深圳专业作家中,女性同胞又占绝大多数,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若说文学界“阴盛阳衰”,深圳尤为突出。究其原因,据说是特区给男性同胞提供的机会更多,于是男女学古代分工,男的做生意女的“爬格子”,此说是否在理,留待以后论证。

黎珍宇与张黎明是深圳土生土长的专业作家,她们有许多移民作家没有的对深圳乡土独特的体验,都是擅长写女性题材,文笔泼辣,各有特色,并一直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相对而言,黎珍宇更是高产作家,她完成长篇三部曲《再见,船长》、《生命的湖》、《无土流浪》,中篇小说集《女子公寓》等作品后,又将完成长篇《界河正在消失》的创作,成为广东有实力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中篇代表作《你我相逢在香港》,透视深圳人眼中的香港世界,写得维妙维肖。

张黎明从处女作《朗·策史葛舅舅》起步,到发表长篇小说《我的一只眼睛没有流泪》,至今已有12年的创作实践,展示出她在小说艺术把握方面不断走向成熟。93年在《中国作家》发表中篇小说《猴年七月》后,今年4月又在《作品》发表中篇《被季节困扰的女人》,旋即被《作品与争鸣》选登,并引起京华评论界关注。两部中篇均以深圳股市为背景,刻划转型期都市人浮躁、骚动的复杂心态,抨击“金钱拜物教”带来对人类的心灵困扰。作品时常使用讽喻、调侃的笔锋,透出一种冷峻的幽默。主人公“笑里

藏哭”的心态,表现出作家本人的忧患意识。

乔雪竹曾以长篇小说《无碑年代》在广东省获奖,另一部长篇《城与夜》也即将出版。近期她正在进行《深圳的先民》等影视创作。李兰妮当初是以中、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的,近年来却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她似乎想远离俗世的喧嚣,去寻找一种心境的闲适与恬淡,但又常常掩盖不住内心的激情。其散文集《一份缘》,大都属淡笔浓情之作,在深圳散文界独树一帜。

与上述几位相比,彭名燕象是闯进深圳文坛的一匹“黑马”。她调进特区不到二年,就写出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38万字的长篇小说《世纪贵族》。作品以深圳特区的国营大企业改革为聚焦点,真实地描画了一批时代弄潮儿从艰苦创业到挺进国际市场的征程,其视野广阔,纵横捭阖,展示了现代都市风情和大潮中的都市人群像,是近年深圳长篇创作不可多得的佳构。

从事专业的文坛娘子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保持执着的文学追求,固守作家是人类良知的代表这一信念,在不断寻找精神家园中张扬人性人道与精神价值,尽管在她们还要走向寂寞的路程。

景观之三:严肃文学通俗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应运而生。迪斯科、摇滚乐、流行歌曲、卡拉OK的兴起,激发了个人参与娱乐的民主意识,使个人的情感、意愿、欲望得到充分、自由的宣泄和表达,因而得到大众的认同与热衷。与此同时,市场机制也介入了文学形态,促使相当部分文学作品进入流通领域,增长了许多作家的“大众文化心态”,于是,“严肃文学通俗化”便成了鹏城又一文学景观。

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纪实体报告文学兴起

深圳较早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是来自公安和边检的作家刘志文与黄日旭,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但一直在市场悄悄流行。在描写特区创办之初新人新事新气象的报告文学退潮之后,由市委宣传部写作组采写的长篇纪实体报告文学

《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策划与审定:倪元禄;执笔:陈秉安、梁兆松、胡戈),熔思想与艺术、史实与理论为一炉,大跨度、全景式俯视、展现特区发展进程,形成一种“雄强博大”的艺术风格,(同时也带着思辩报告有余、文学色彩不足的遗憾)在深圳报告文学领域开风气之先,这在报告文学越来越“广告化”的流风之中,起到了提升报告文学层次与品位的作用。尔后属这类风格的报告文学有《深圳的维纳斯之谜》(策划与审定:倪元禄;执笔:陈秉安、赵尉杰、文炼中、安子)、《深圳传奇》(倪振良)、《中国魂在深圳震荡》(蒙敬杭、朱子春)以及正在组织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纵横》。朱崇山描写宝安风貌的报告文学,也属于此类型。在纪实文学和人物传记方面,近期较有影响的有《李嘉诚传》(夏萍)、《深圳的一百个女人》(苏灵)、《白领、蓝领》(黄日旭)、《新鸳鸯蝴蝶梦》(燕子)等。

二、期刊推出“消费文学”

深圳有文学期刊三家:《特区文学》、《大鹏湾》、《罗湖》。而综合性期刊则有十余家,如《深圳青年》、《深圳风采》、《女报》、《深圳人》、《特区窗口报》等等。为迎合市场的需要,近期各综合性刊均推出诸如“社会热点”、“名人情史”、“明星轶事”、“黑幕佚闻”、“都市风流”一类的“消费文学”,颇具“快餐文化”的品味,并大都配上美女封面,八仙过海,各显“消费”,令人目不暇接。就连正式的文学期刊,亦难免俗。由此足见大众流行文化对深圳文坛的覆盖率。

三、作家“造市”与“随俗”倾向

市场经济是个大课堂,它告诫作家不能躺在“象牙之塔”营造“纯”而又“纯”的作品。在市场机制面前,高雅(严肃)文学也是商品,与通俗文学一样需要市场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通俗文学要迎合读者、迎合市场,而高雅(严肃)文学要去创造读者,创造市场。于是,在深圳的土地上,一批作家开始了文学“造市”的实践。他们大都有两副笔墨,既可写严肃的或探索性的小说,亦可写出“雅俗共赏”的作品。如倪振良的《深圳传奇》、王小